

# 編後語

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內部依然存在着眾多治理問題，其中邊疆地區的治理更是錯綜複雜。2009年烏魯木齊爆發的「7·5」事件將邊疆治理問題的嚴重性凸顯出來。實際上，這並非新的問題。在中華帝國上千年的統治史中，「邊政」無時無刻不困擾着朝廷。絕大多數「邊政」問題，既同中華帝國內部統治精英的權力鬥爭有關，也同外部勢力的滲透擴張有關。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匯聚了兩岸三地的四位政治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的反恐與邊疆治理進行了分析。沈旭暉運用國際關係領域中「非國家行動體」的研究框架，詳細考察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政治生態，而這一外部勢力至少在中國政府眼裏是對新疆治理的最大威脅。總體來看，「東突」並非扎根本土，對國際資源的依賴程度甚高，但在國際舞台上，沒有贏得像達賴喇嘛那樣的影響力和輿論支持，反而被國際社會拿來和其他激進伊斯蘭勢力相提並論。東突運動的發展空間，其實頗為有限。

當然，「非國家行動體」的網絡再強大，無論如何也不能與主權國家建立的正式國際組織相比肩。根據李銘義的研究，在歐亞大陸結合部，尤其是在冷戰後新興起的地緣戰略板塊，上海合作組織在中國和俄羅斯的主導下，日漸活躍，在打擊「三股勢力」（即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中發揮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實際上，這也是東突發展空間有限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來自外部的疆獨勢力發展空間有限的背景下，侍建宇和張健直面中國政府處理新疆邊政的思路。在他們看來，將新疆問題歸結為「三股勢力」的威脅，並在此基礎上將少數民族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泛政治化，不利於邊疆治理。侍建宇考察了傳統大陸性帝國的邊疆經略，從歷史反思當今中國的邊政。張健深入挖掘了「疆獨」的蘇聯根源，剖析了其發展的狹小空間，對中國政府持續以「統一和分裂」的鬥爭來處理新疆等地族際矛盾的做法發出了警示。這同我刊上一期姚新勇的批評相類似。

對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建構國民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是民族國家建設 (nation-state building) 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史靜對建國初期少數民族電影文本的分析，剖析了國民認同建構與執政黨意識形態灌輸之間複雜的糾葛關係如何導致電影敘事策略的非自然性。其實，對世界多民族國家國民認同的建構過程（無論成功與否）進行比較研究，是一項饒有興味的學術工作，有待社會科學家們的深入探索。

本期的其他文章也提出了一些饒有興味的研究問題並給出了饒有興味的解答。俞江指出，農民養兒防老並非落後的觀念，而是基於家產制的理性選擇；如果農村的現代社會制度建設不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將難以突破困局。時磊、楊德才發現文革時期中小學教育有出人意料的擴展，這主要緣於文革期間受教育的機會成本下降、教育成本下降，以及城鄉和幹群之間的收入差別。